

大师书斋



王国维

精读王国维

大师书斋

精读王国维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精读王国维 / 刘琅主编. — 厦门: 鹭江出版社, 2007. 8
(大师书斋)

ISBN 978-7-80671-471-3

I. 精... II. 刘... III. 王国维 (1877~1927) - 文集
IV. 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4112 号

精读王国维

刘琅 主编

出 版 / 鹭江出版社

地 址 /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

邮 编 / 361004

电 话 / 0592-5046666 0591-87539330 010-62376499

印 刷 /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

开 本 / 635×965 1/16

印 张 / 27.25

版 次 / 200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671-471-3

定 价 / 35.00 元

(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。)

王静安先生学行小传

刘梦溪

王国维，字静安，又字伯隅，浙江海宁人。1877年12月3日（农历十月二十九日）出生于海宁州城之双仁巷自宅。先生先世籍河南开封，远祖王光祖《宋史》有传，因征御北方边族有功，被封为泾原河东定州路副总管。光祖子王稟，忠义勇武，战功卓著。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记载：“王稟性质沈雄，智谋深静，便弓剑之习，负劲气于山西，贯韬铃之奇，走雄名于塞北，久率戎伍，夙著战功。”而靖康元年（公元1126年）九月初三日，已被金兵围困二百多天的太原眼看就要陷落之时，王稟率部巷战，身披数十创，还到城里庙中背负太宗的塑像，与子之全家跳汾河自尽。后高宗南渡，追封稟为安化郡王，赐谥“忠壮”。这是王氏家族史上最辉煌的一幕。

明代中期以后，王氏家族开始中落。而此前在元代，已经成为“世为农商”的家庭。王稟之后凡三十四传，至先生父王乃誉。乃誉事商贾，而喜书画篆刻，淡名利，富收藏。四十岁便家居而不复出。尝作《游目录》十卷，诗集二卷，家藏未行世。静安先生深受其父之影响，如同异母弟王国华所说：“先兄一生淡名利，寡言笑，笃志坟典，一本天性，而弱冠内外，其有承于先君子者尤众。”先生母凌氏，当其4岁尚不能记忆之时即亡故，后由祖姑母和叔祖母抚养；越5年，王乃誉续娶，则与继母生活在一起。先生对继母叶氏甚敬畏，即使与少年友人冶游聚会，也总是守时归家，不敢延宕致使继母失欢。先生之寡言忧郁之性格，实童年生活境域使然。

先生7岁入私塾就读，颇习诗文时艺。王乃誉家居后，以“课子自娱”，要求尤其严格，几易塾师，犹不惬意。但先生雅好诗词，15岁已代

父作挽诗。16岁参加岁试，以第二十一名入州学。翌年，赴杭州应乡试，不终场而归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清军战败，震动朝野，先生亦深为所动，遂开始向往新学。但由于家境贫寒，没有条件出国留学。其自述有云：“甲午之役，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。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，居恒怏怏。”1896年夏天，先生开始担任城内一沈姓家之塾师。同年，与同邑出身商人家庭的莫氏女结婚。次年，再赴杭州应乡试，又不中。从此弃绝举业，绝意仕途。尝与同乡张英甫等计划创办海宁师范学堂，因款项无着未果。虽然，先生之笃志于学及热心教育之抱负于此可见一斑。

二

1898年这一年是先生人生的转折点。

这一年新正伊始，他就离别妻室，来到上海，到《时务报》馆担任书记及校对的职务。不过不是正式应聘，而是因供职于《时务报》馆的同乡举人许默斋返乡处理事务，暂作为代理，无非校对、抄写之类，实际地位相当之低。《时务报》是维新派的重要舆论园地，系汪康年、王颐年兄弟创办，梁启超曾任主笔。而是年3月，罗振玉创办的日语志科学学校东文学社开学，王国维经报馆同意每天下午前往学习三个小时，因得以结识罗振玉。从此先生一生之命运便与罗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

罗字叔蕴，号雪堂，浙江上虞人，1866年生，比王国维年长12岁。早年亦致力于欧西新学的介绍，并热心教育，曾创办《农学报》，组织农学会；与张之洞关系密切，担任过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学堂总督；精于小学、金石、甲骨之学，是现代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古文字、古器物学者。大内档案得以保存，罗氏与有功焉。罗氏政治上的保守立场，使得当时后世颇遭疵议；但对其治甲骨文字和古器物的成绩，文史学界鲜有异词。罗、王相知，起因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一个同学的扇面上题写的一首《咏史》诗：

西域纵横尽百城，张陈远略逊甘英。

千秋壮观君知否，黑海西头望大秦。

罗氏看到大为激赏，叹为异才，于是着意扶植培养，虽考试成绩欠

佳,也宁愿保留其学习机会,使之无后顾之忧。

同年8月,戊戌政变发生,康有为、梁启超逃亡国外,谭嗣同、刘光第等六君子罹难。先生于此气愤之极,写信给许默斋说:“今日出,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,蔽罪亡人不遗余力,实堪气煞。危亡在旦夕,尚不知病,并仇视医者,欲不死得乎。”不久《时务报》停办,先生则因治疗脚病返回海宁。本年底病愈后又来到上海,重新进入东文学社实习日文,同时奋力研习英文,间做庶务,直至1900年学社解散。学社教师有日人藤田丰八、田冈佐代治二氏,对先生为学均有影响。这是先生打开视界、努力掌握治学工具时期,为日后的学业拓展铺设了必要条件。

罗振玉1900年下半年应鄂都张之洞之邀总理湖北农务局,先生亦于同年底前往湖北,参与罗氏策划的农书译事。所译之日人的《日本地理志》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再次年,即1902年的岁首,受罗之资助,先生尝东渡日本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。当时正值戊戌之后,维新党人云集东瀛,王国维以为并非吉兆。他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说:“诸生骛于血气,结党奔走,如燎方物,不可遏止。料其将来,贤者以殒其身,不肖者以便其私。万一果发难,国是不可问矣。”其担心疑惧之情跃然纸上。后因脚气病发作,当年夏天即回国,滞留上海,住罗振玉家中,并协助罗编辑《教育世界》杂志。同年秋,应教育家张謇之聘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。这时罗振玉已开始注意甲骨文字的研究,刘鹗著录的《铁云龟藏》就是罗氏协助校印的,并为之撰写序言。王国维接触甲骨文,也是在这个时候。但他此时的主要兴趣在哲学、教育和诗词创作。1904年,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校,也曾聘请先生任教职。罗创办的《教育世界》杂志,本年改由王国维主编。

《教育世界》是罗氏于1901年在武昌创刊的专门译介世界各国教育规章制度及学说的刊物,印行在上海。实际上相当于教育译丛,其中介绍日本教育规制的文章最多。开始为旬刊,王国维接手后改为半月刊,对原来的宗旨也有所更易,增加了本社自撰部分,包括论说、学制、训练、传记、小说、国内外学界动态等,都予以刊载。托尔斯泰的小说《枕戈记》,即由王国维从日文移译发表在《教育世界》上。他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和美学文字,如《哲学辨惑》《论教育之宗旨》《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》《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》《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》《释理》《论性》《周秦诸子之名学》《红楼梦评论》《论近年之学

术界》《论新学语之输入》等，都发表于此刊。这是王氏建构自己学术大厦的一块重要园地。《静安文集》也是由《教育世界》社刊行的。此一时期，先生在用西方哲学美学思想诠释中国古典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。所以，这是王国维生平学术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，也就是醉心于哲学、美学等欧西新学时期。

先生自己称这一时期为“独学时代”，他说：“体素羸弱，性复忧郁，人生之问题，日往复于吾前。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，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，亦即藤田君也。次岁春，始读翻尔彭之《社会学》，及文之《名学》、海甫定《心理学》之半。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，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《哲学概论》，文特尔彭之《哲学史》，当时之读此等书，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。幸而已得读日文，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，遂得通其大略。既卒《哲学概论》《哲学史》，次年始读汗德之《纯理批评》。至《先天分析论》几全不可解，更辍不读，而读叔本华之《意志及表象之世界》一书。叔氏之书，思精而笔锐。是岁前后读二过，次及于其《充足理由之原则论》《自然中之意志论》，及其文集等。尤以其《意志及表象之世界》中《汗德哲学之批评》一篇，为通汗德哲学之关键。至二十九岁，更返而读汗德之书，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。嗣是于汗德之《纯理批评》外，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。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，则窒碍更少，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。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，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。”这是写于1907年的《静安文集》自序中的话，向读者交代他研究欧西学术思想的过程。

但结果如何呢？他在自序二中又写道：“余疲于哲学有日矣。哲学上之说，大都可爱者不可信，可信者不可爱。余知真理，而余又爱其谬误。伟大之形而上学，高严之伦理学，与纯粹之美学，此吾人所酷嗜也。然求其可信者，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，伦理学上之快乐论，与美学上之经验论。知其可信而不能爱，觉其可爱而不能信，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，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，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。要之，余之性质，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，而知力苦寡；欲为诗人，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。诗歌乎？哲学乎？他日以何者终吾身，所不敢知。抑在二者之间乎？”涉猎、研究西方哲学的结果，使他充满了矛盾。盖先生之研究学问，每一时期都是与自己的生命处境结合在一起的，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矛盾，不如说是生命存在形态的矛盾更为确当。作为

诗人哲学家的个性特色,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。

1906年,罗振玉入北京学部任参事,先生协同北上,并住在罗的家里。第二年,经罗振玉引见,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庆,受到赏识,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,同时担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之职。他写给张之洞的长信《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之后》,就在这个时候。信中明确提出,经学科大学生和文学科大学生的课程设置有经学而没有哲学,是根本性的错误。盖先生在沉醉于欧洲哲学、美学的同时,对东西教育思想也作了深入的研究。《教育世界》上曾发表多篇他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可作为证明。其中,刊载于1906年出版的《教育世界》第十三期上的《去毒篇》一文,尤值得我们注意。当时社会有识之士对鸦片之为害无不深恶痛绝,但怎样才能彻底根除,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写道:

禁鸦片之根本之道,除修明政治,大兴教育,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,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。其道安在?即宗教与美术二者是。前者适于下流社会,后者适于上流社会;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,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。兹二者,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,亦其所最需要者也。

他甚至还说“感情上之疾病,非以感情治之不可”,把情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之一,这是王氏的特见,应看到这是切合我国国情的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。1906年这一年,先生还集近几年所填之词,成《人间词甲稿》,托名樊志厚者为之序,称“其言近而旨远,意决而辞婉,自永叔以后,殆未有工如君者也”。翌年,成《人间词乙稿》,也是托名樊志厚撰写序言,标出了“意境”这个概念,提出:“文学之事,其内足以摅己,而外足以感人者,意与境二者而已。上焉者意与境浑,其次或以境胜,或以意胜。苟缺其一,不足以言文学。”“境界说”是先生美学上的一大发明,嗣后所撰之《人间词话》,对境界理论发挥更为详尽。

先生之父尊王乃誉逝于本年,尝归里奔丧,并作《先太学君行状》。丁忧守制期间,乡先生尝推举先生为本乡学务总董,却不就,提出:“吾浙一省尚无完全之师范学校,其高等学堂附设之师范简易科卒业者,学术卤莽,教授拙劣,断不足以胜教员之任。”又说:“就地方教育情形,非

学部统筹全局，立其根本，则虽圣贤豪杰无以善其后，况不才如某者乎。某尚欲研究学问，又将有四方之役，未能以身委诸一邑之公益也。”先生对晚清教育现状的体认别具卓识。他的指陈辜鸿铭翻译错误的《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》，也是这一年所写，发表在《教育世界》杂志。值得注意的是20年后《学衡》重刊此文，他所作的一番说明：“此文作于光绪丙午，曾登载于上海《教育世界》杂志。此志当日不行于世，故鲜知之者。越二十年，乙丑夏日，检理旧篋始得之。《学衡》杂志编者请转载，因复览一过，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，少年习气，殊堪自哂。按辜君雄文卓识，世间久有定论，此文所指摘者，不过其一二小疵，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，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，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。”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学术思想的变迁，以及他的足以启导后世的自省精神。

静安先生在职学部的时间是在1907年春天。恰好本年5月法人伯希和氏运敦煌写本经卷过京师，他有机缘和罗振玉一起前往观看，并将其中一些作了过录，因而结识了伯氏这位日后对他的学术甚有影响的著名汉学家。7月，原配莫氏病故；阴历年底，继母叶老太太亦辞世。先生两返海宁，料理丧事。家庭屡遭不幸，对先生之精神打击也大矣。1908年3月，续娶莫氏之侄女潘氏为继室。4月，携眷北上，仍任职学部，寓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。1909年，兼任学部名词馆协修，严复为总纂。这一时期，先生之学已由哲学和美学转向文学和戏曲研究。京师人文荟萃，图书条件便利，词曲等古籍善本年来先生多有所得，从而引发新的学术兴趣。《曲录》《优语录》《录曲余谈》《曲调源流表》《古剧脚色考》《录鬼簿校注》，以及《清真先生遗事》等词曲著作，均成于此一时期。这一时期的另一大著述是《人间词话》。在总结自己诗词创作经验基础上，以新观念接通古人，诠释境界说的多重意涵，成独家之诗学体系。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静安先生说这是“古今成大事业者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”。则其论诗论词，学问之门径修养固未肯稍忘，实亦包含己身为学进路的深切体会。《人间词话》最初连载于《国粹学报》，是为上卷；下卷系门人赵万里整理，发表于十九卷三号之《小说月报》，已经是先生逝世之后了。

罗振玉1911年创办《国学丛刊》，先生为之序，写道：“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。今之言学者，有新旧之争，有中西之争，有有用之学与无用

之学之争。余正告天下曰：学无新旧也，无中西也，无有用无用也。凡立此名者，均不学之徒，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。”罗振玉为《国学丛刊》所作之序，也是出自先生之手，叙古往今来学术衍变，言简意赅，独具只眼。

四

辛亥革命发生之后，罗振玉避地东瀛，先生亦随之前往，同寓于日本京都附近的吉田山下之田中村。罗振玉丰富的收藏也运往日本，寄存在日本京都大学。先生则每天协助罗氏整理藏书、编写书目，因而得以尽阅“大云书库”所藏之古籍、古彝器及各种古器物的拓本。这时先生的学问兴趣，开始仍在中国戏曲的研究与考证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《宋元戏曲考》即撰成于此时。该书最后之完稿时间应在1913年的年初，其所撰自序写道：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：楚之骚，汉之赋，六代之骈语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元之曲，皆所谓一代之文学，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。独元人之曲，为时既近，托体稍卑，故两朝史志与《四库》集部均不著于录，后世硕儒，皆鄙弃不复道。而为此学者，大率不学之徒；既有一二学子，以余力及此，亦未有观其会通，窥其奥窔者。遂使一代文献，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，愚甚惑焉。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；以为能道人情，状物态，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，盖古所未有，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。辄思究其渊源，明其变化之迹，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，弗能得也；乃成《曲录》六卷，《戏曲考原》一卷，《宋大曲考》一卷，《优语录》二卷，《古剧脚色考》一卷，《曲调源流表》一卷。从事既久，续有所得，颇觉昔人之说，与自己之书，罅漏日多，而手所疏记，与心所领会者，亦日有增益。壬子岁暮，旅居多暇，乃以三月之力，写为此书。凡诸材料，皆余所蒐集；其所说明，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。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，其所贡于此学者，亦以此书为多，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，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。”此书学术上的开辟意义，静安先生本人阐述甚明，诚如梁启超所说：“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，则静安当为不祧祖矣。”

但到日本后，没有多久，由于受罗振玉氏的影响和启发，先生之治学方向即转向经、史、小学的考证与研究，而对自己以往的哲学和美学研究，则弃之如敝屣。即戏曲与文学的研究也基本停顿下来。据罗振玉

回忆，他劝王专门研究国学并从小学和训诂方面培养根基，曾说过下面的话：“方今世论益歧，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缕，非矫枉不能返经。士生今日，万事无可为，欲拯此横流，舍返经信古未由也。公年方壮，予亦未至衰暮，守先待后，期与子共勉之。公闻而悚然，自慰以前所学未醇，乃取行篋《静安文集》百余册悉摧烧之，欲北面称弟子。予以东原（戴震）之于茂堂（段玉裁）者谢之。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。”罗氏的话，有人以为不尽确实，认为王未必烧书。其实以王国维的性情论，尽弃前学，完全可能。日人狩野直喜在回忆王在日本的印象时也说过：“从来京都时开始，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，似有所改变。这是说，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，有志于创立新见解。例如在谈话中，我提到西洋哲学，王君总是苦笑着说，他不懂西洋哲学。”透露出决心改变学术路向的信息。在1913年和1914年，先生全身心致力于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的沉迷状况，我们从他写给缪荃孙的信里可以获知大体轮廓。一则曰：“今年发温经之兴，将《三礼注疏》圈点一过。阮校尚称详密，而误处尚属不少，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，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，臧、洪诸君非不通礼学，而疏漏如是。此系私家著述，犹不免是病，无怪官书之不能善也。”二则曰：“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，因先治古文字，遂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。此事自宋迄近数十年无甚进步，《积古》于此事有筌路蓝缕之功，然甚疏陋，亦不能鉴别真伪。《筠清》出龚定庵手，尤为荒谬。许印林称切实，亦无甚发明。最后得吴清卿乃为独绝，惜为一官所累，未能竟其学。然此数十年来，学问家之聪明才气未有大于彼者，不当以学之成否、著书之多寡论也。”这两封信分别写于1913年11月和1914年7月，从而可见其沉潜古学的精神和钻研的深度。先生的《流沙坠简》及其《考释》（与罗氏合作）、《简牍检署考》、《明堂寝庙考》、《生霸死霸考》、《胡服考》、《宋代金文著录表》、《国朝金文著录表》等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。此外还有《颐和园词》也作于此时。总之寓居日本四年多时间，先生之学术大变，他自己后来也说，此一时期“成书之多，为一生之冠”。

1915年春天，先生曾归国扫墓，因得以在上海与沈曾植相识。沈字子培，号乙庵，晚号寐叟，浙江嘉兴人。光绪六年进士，钦用主事，观政学部，迁员外郎，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。曾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和张勋复辟。精通辽金元史及西北舆地之学，世以大儒目之。王的

思想和学术旨趣与沈甚契合。沈欣赏王为罗振玉作的《殷虚书契考释后序》，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；并称赞王善于命题，趣说：“君为学，乃善自命题，何不多命数题，为我辈遣日之资乎？”1919年沈70寿诞，王为之序，极称乙庵之学的博大，写道：“世之言学者，辄怅怅无所归，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，以为亭林、东原、竹汀者俦也。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，中年治辽金元三史，治四裔地理，又为道咸以降之学，然一秉先正成法，无或逾越。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，政事之利病，必穷其原委，似国初诸老。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，而益探其奥窔，拓其区宇，不让乾嘉诸先生。至于综览百家，旁及二氏，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，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。若夫缅想在昔，达观时变，有先知之哲，有不可解之情，知天而不任天，遗世而不忘世，如古圣哲之所感者，则以其一二见于歌诗。发为口说，言之不能以详，世所得而窥见者，其为学之方法而已。”又说：“趣博而旨约，识高而议平，其忧世之深，有过于龚、魏，而择术之慎，不后于戴、钱。学者得其片言，具其一体，犹足以名一家，立一说。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，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以此。”可以说给予了不能再高的评价，我们由此可知静安之学的格致与归宿。而当1922年沈氏在上海辞世，静安先生的挽联写的是：“是大诗人，是大学人，是更大哲人，四昭炯心光，岂谓微言绝今日；为家孝子，为国纯臣，为世界先觉，一哀感知己，要为天下哭先生。”可见两人交谊之厚。

沈曾植在静安先生眼中始终始终是学术的楷模。虽然，当1917年7月1日军阀张勋在康有为等谋士的策划下，拥立溥仪再次登极复辟，沈以为时机已到，于是北上任职，而在失败之后又从容南返。静安先生颇有不以为然，他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说：“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，如再腴然南归，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。”他希望沈没有南归，写道：“寐叟于前日已有传其南归者，此恐不确也。”实际上，静安先生素所尊敬的沈寐叟确实在事败后即回到了上海。还有当时海上诸铭公都喜欢书画和善本图籍，而尤以先生、沈寐叟和罗振玉用力最勤。围绕图籍版本的年代以及书画的真伪等问题，王、沈曾发生过意见分歧。就一代通儒的学术气象而言，沈的标格，世罕其匹；就一个纯粹学人的为学精神而言，王恐怕应站在沈的右边。明了这一层可以正解王、沈之针介之歧与针介之合。

陈寅恪在《王静安先生挽词》中对先生此一时期的学术景观有极为准确的评价：“大云书库富收藏，古器奇文日品量。考释殷书开盛业，

钩探商史发幽光。当世通人数旧游，外穷赢渤内神州。伯沙博士同扬榷，海日尚书互倡酬。”“伯沙博士”指的是法国的两位汉学家伯希和暨沙畹博士；“海日尚书”是指沈曾植。意谓静安先生此时已成为与中外学界顶尖人物并驾齐驱的学者。

五

王国维中年以后为学途径更见精深。当他 1916 年从日本回到上海（头一年扫墓、安顿家眷后又返回日本）的时候，正值不惑之年。他应聘担任哈同广仓学的《学术丛编》主任。哈同是英籍犹太人，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，因而把有哈同花园。哈夫人名罗诗，系混血，传说出身娼寮，其所办的“仓圣明智大学”，实相当于教人识字的小学或初中，但其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是真实的。王国维知其利弊，遂不就“大学教务长”之聘，只包办《学术丛编》，其宗旨为：“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，文字源流，以期名上古之文化，解经典之奥义，发扬古学，沾溉艺林。”经王之手，《学术丛编》共出版 24 期，王的许多关于金石、考古、音韵、文字学方面的文章都刊载于此刊。广仓学同时还出版《艺术丛编》，由邹安主编，介绍静安先生到哈同来的就是这位也叫景叔的海宁同乡。王、罗的一些文字有的也在《艺术丛编》上刊载。1918 年起，王国维担任仓圣明智大学经学教授。于是他写了《经学概论讲义》一书，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。同时，先生还为乌程蒋氏编写藏书志。蒋氏名孟莘，号乐庵居士，与先生同籍浙西，生亦同年。其“传书堂”是江南名藏，被称为海上三大藏书家之一。此前蒋氏尝聘请吴县曹元忠编写藏书目录，但历时一年，未成一字。蒋早有聘王之意，因王与曹有旧，不忍遽夺；俟曹辞去，静安先生方应聘，但接事之后工作态度极为认真，为做好先期准备，用很多时间遍校各书，一一写出跋记。对王国维来说，这是继在日本得以尽窥“大云藏书”之后，再一次获得了遍览群籍的机会。

先生为学的几个阶段，都有特藏之书供其饱览。尝说：“余毕生惟与书册为伴，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，亦惟此耳。”而为学之精勤，又非常人所能及。对先生生平志事颇为了解的赵万里对此曾有过下述说明：“盖先生之治一学，必先有一步预备工夫，如治甲骨文字，则先释《切韵》、《广韵》。撰蒋氏《藏书志》，则遍校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等书不

下数十种。其他遇一佳槧，必移录其佳处或异同于先生自藏本上。间有心得，则必识于书之眉端。自宣统初元以迄于今，二十年间，无或间断。求之三百年间，实于高邮二王为近，然方面之多，又非怀祖、伯申两先生所可能也。”这一时期的主要论著包括《史籀篇疏证》《殷礼征文》《魏石经考》《毛公鼎考释》《汉博士考》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及《续考》和《殷周制度论》《唐韵考》《五声说》《西胡考》等，都是代表王氏毕生学术成就的重要著作。

特别是《殷周制度论》之刊布，学界佳评如潮。赵万里写道：“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页，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。”先生自己代罗振玉为此书所写的序言，也称：“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及《殷周制度论》，义据精深，方法缜密，极考证家之能事，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，言之尤为真切，自来说诸经大义，未有如此之贯串者。盖君之学，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，并其立制之所以然。其术皆由博以返约，由疑而得信，务在不悖不惑，当于理而止。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。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，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。”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他还说：“《殷周制度论》于今日写定。其大意谓周改商制一出于尊尊之统者为嫡庶之制，其由是孳生有三：一、宗法；二、服术；三、为人后之制。与是相关者二：一、分封子弟之制；二、君天下臣诸侯世，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皆不世之制（此殆与殷制同）。又同姓不婚之制，自为一条，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，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于道德，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。政治上之理想，殆未有尚于此者。文凡十九页。此文于考据之中，寓经世之意，可几亭林先生。惟文字未能修饰尽善也。”可以看出先生对此篇著述何等重视。我们不妨引录原著中的一段论述以见其精醇：

殷周间之大变革，自其表言之，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；自其里言之，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，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。又自其表言之，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，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；而自其里言之，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，乃出于万事治安之大计，其心术与规摹，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。

如此清晰之理念、闪光之思想，很难想象是从静安先生那样羸弱的躯体中迸发出来的，而且是通过耙梳枯燥的甲骨文字得不来的不易之论。静安先生是纯粹的学者，固然；但他也是时代的思想家。而集中反映这一时期学术成果的《观堂集林》二十卷，也成书于此时，由先生手自编定，后由乌程蒋氏出资以聚珍版印行。前面有蒋、罗（振玉）二氏撰写的序言，而罗之序系先生代笔。

这一时期，先生还曾参与《浙江通志》的续修工作。沈曾植为总纂，先生与张尔田一起担任寓贤、掌故、杂记、仙释、封爵五门的撰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沈向王说明“通志”编写体系的一封信写得甚具大儒风采。信中称王国维为“大哲学家”（王挽沈之联语称沈为“更大哲人”不知是否从这里获得灵感），并提出了“显学巨儒，实有关于一代风气者”的论断。这一时期，先生对时事政治的变迁也相当关心，除经常和在上海的沈曾植保持密切联系，与身处北京的元史专家柯劭忞联系也比较多。柯字凤荪，号蓼园，所著《新元史》，享誉士林。1917年俄国“十月革命”爆发，王尝致书风老，认为北方邻国的这场革命之风会吹到中国来，并对时局作出预测：“观中国近状，恐以共和始，而以共产终。”如果撇开政治是非的判断，则静安先生的预测早已被后来的事实所验证。沈、柯两老当时有“南沈北柯”之称，政治上固是守旧派。由此可知静安当时的心境和对时局的态度。先生给日人狩野直喜的信里曾说：“世界新潮洞澎湃，恐遂至天倾地折。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，非是不足以扫荡，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，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。”则先生关注时局，也包含有自身的文化理想能否得以实现的成分在内。

罗振玉当时仍在日本，王给罗的信里也总是把国内时局变化情形随时报告给罗。1918年，罗、王联姻，王之长子潜明娶罗的次女为妻，成为儿女亲家，两人之关系又进了一层（两人之失和亦由此埋下种子）。1919年罗回到天津以后，王曾赴天津罗宅小住养病。因罗的介绍，得识逊帝溥仪之顾问升允，为后来入值南书房行走做了铺垫。此时，先生曾多次接到北京大学欲聘请为导师的邀请，均婉拒。1923年7月，又有专人带来马衡教授的亲笔信并修金200元，情辞至恳，始答允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，但修金请来人即带还。是年底，曾写信给沈兼士，拟出“研究发题”四项，作为北大国学门的参考选题：（一）《诗》《书》中成语之研究；（二）古字母之研究；（三）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；

(四) 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。并对各题之研究价值暨已有之研究现状逐一作了说明。盖先生一经答允导师之任,便冀图有贡献于诸生,而不愿徒托空名。

六

1923年王国维到北京入值南书房,开始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。

辛亥革命的第二年,也就是在溥仪当了3年皇帝之后,下诏逊位,但仍住在紫禁城。一应礼仪体制,继续保持皇家气派,所以才有“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”的举措。溥仪的谕旨是1923年农历三月初一发出的,同时选中的还有杨鍾羲、景方昶、温肃。到北京的时间是四月十六。但五月中旬故宫失火,烧毁建福宫等宫中建筑一百多间,入值办法一直不能确定下来。六月初一日方发出“谕旨”：“加恩赏给五品衔,并赏食五品禄。”六月中旬始决定,每六日入内一次。对先生而言,是很闲暇的。他感受到了京城的寂寞。而笔墨应酬却不少,虽不善书,扇面已写了二十幅。年底,又奉“谕旨”：“着在紫禁城骑马。”虽时代早已是民国,王国维仍视为“异遇”。而次年,便有冯玉祥逼宫事,溥仪被逐出紫禁城,并永远废除皇帝称号。因事变发生在1924年(农历甲子年),所以又称做“甲子之变”。溥仪离京赴津,他也不时在张园被“召对”。但这时先生已接受清华学校之聘,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。此事系胡适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。开始先生并未应允,答应考虑一个星期,经溥仪下了一道“圣旨”,才正式应聘。

关于先生何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应聘清华,而北大之请则困难重重,个中缘由说来相当复杂。一是静安先生可能不愿接受北大的“新潮”,二是他感觉到北大似乎存在派系问题。这后一方面,他1924年写给蒋汝藻的信里曾有所透露:“东人所办文化事业,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,此间大学诸人,亦希其意,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(此说闻之日人)。但弟以绝无党派之人,与此事则不愿有所濡染,故一切置诸不问。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,弟亦不复措一词。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,亦互相恶,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。”鉴于如是之看法,静安先生与北大的关系实维持在“远近之间”。但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,使王甚为不快,这就是北大考古学会发表《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》,指陈

皇室“占据官产”“亡清遗孽擅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”等等。王国维看到后当即致函沈兼士和马衡，一一为之辩解，并将问题置诸社会法律的高度，措辞强硬地写道：

诸君苟已取消民国而别建一新国家则已，若犹是中华民国之国立大学也，则于民国所以成立之条件与其保护财产之法律，必有遵守之义务。况大学者全国最高之学府，诸君又以学术为己任，立言之顷不容鲁莽灭裂如是也。抑弟更有进者，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，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，而保持古物不过学术中之一条目，若为是故而侵犯道德法律所公认为社会国家根本之所有权，则社会国家行且解体，学术将何所附丽？诸君所欲保存之古物，欲求其不为劫灰岂可得乎？即不然，强有力者将以学术为名，而行掠夺侵占之实，以自盈其囊橐，诸君所谓文献将全为齑粉者将于是乎实现，不审于学术何所利焉？于诸君何所利焉？

王国维在信函之末尾特别注明他是“以考古学者之资格”写这封信的，为的是“敬告我同治此学之友”，而不是以“皇室侍从”的身份来讲话。而信后面的“再启者”更其决绝不留余地，提出取消他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，研究生前来咨询事“饬知停止”，甚至已交给《国学季刊》的文章也要求“停止排印”，等于完全断绝了与北大的诸种学术联系，这是静安先生晚年非常不幸的一件事。

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，是一旨在研究高深学术、造就专门人才之机构。1925年4月17日（农历三月二十五日），先生携全家搬入清华园西院18号居住，并提议“多购置书籍”。所聘之导师除王之外，还有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，讲师有考古学家李济，研究院主任则是吴宓，都是当世大儒。在国学研究院开学之前，先生尝以“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发见”为题，向清华学生会演讲，后来改定稿刊载于《学衡》等刊物。研究院九月开学，先生作为经、史、小学科的导师，每周讲授《古史新证》两小时、《尚书》两小时、《说文》一小时。他的著名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就是在《古史新证》中提出的。他说：“吾辈生于今日，幸于纸上之材料外，更得地下之新材料。由此种材料，我辈固得据以补证纸上之材料，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，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